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0.03.014

#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 ——基于重庆与全国的比较分析

应枢廷

(重庆工商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根据全国和重庆市 1987—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VAR 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虽然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服从 Kuznets“倒 U 型”曲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积极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关键词:**金融发展;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城乡收入差距;VAR 模型;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F124.7;F932.7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0)03-0082-07

## 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ongqing

YING Shu-ting

(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VAR model, 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of the Nation and Chongqing from 1987 to 200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conducts the research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between Chongqing and the Nation has subtle differences, they have strong consistency,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Kuznets “the inverted U type” curve while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of active significance to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especially, the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plays a direct role in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us, Chongqing should actively propel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eepen rural financial reform and raise financial agency efficiency.

**Key words:**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scale; financial development efficiency; urban-rural income gap; VAR model; Chongqing

\* 收稿日期:2010-10-11;修回日期:2010-12-29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联研究项目(2008—NTJ01)“收入分配公平的测度研究: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及其应用”

作者简介:应枢廷(1979—),男,江苏金湖人;硕士,在重庆工商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学习,主要从事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方法及应用研究;E-mail:yingshuting611@163.com。

## 一、引言

重庆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重庆的基本市情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据《重庆统计年鉴》(1987—2008)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由1987年的2.87,上升到2007年的3.91,即自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上升了104个百分点。尤为糟糕的是,重庆每年的城乡居民人均相对收入差都比全国的城乡居民人均相对收入差要大0.5左右,即大约50个百分点<sup>[1]</sup>。显然,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统筹城乡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并且其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在我国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因此,将重庆设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示范作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性影响。最早从金融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是Greenwood(1990),他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关系,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也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sup>[2]</sup>。Townsend(2003)进一步论证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sup>[3]</sup>。而Clark(2003)发现金融发展会显著地降低一国的收入分配差距<sup>[4]</sup>。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姚耀军(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并且两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且两者也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sup>[5]</sup>。杨俊、李晓羽、张宗业(2006)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全国、城镇、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sup>[6]</sup>。洪雪峰、王志江(2009)的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可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发展各指标没有反作用<sup>[7]</sup>。翟立宏、徐志高(2009)的研究结果是金融发展规模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也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sup>[8]</sup>。但是,陈志刚、师文明(2008)通过分别建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和含个体

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回归分析发现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sup>[9]</sup>。当然,也有学者试图验证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关系是否符合Kuznets“倒U型”曲线。比如,唐礼智、刘喜好、贾璇(2008)<sup>[10]</sup>,李勇辉、蒋序全(2008)<sup>[11]</sup>,陈伟国、樊士德(2009)<sup>[12]</sup>论证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进程遵循倒“U”曲线的演化路径,即存在Kuznets效应。也有学者利用本省(市)的统计数据研究具体情况,例如,胡金焱、卢立香(2009)基于山东省的统计数据,借助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别从长期和短期两个侧面研究山东省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sup>[13]</sup>。

不难发现,现有的文献多半只是从国家层面或地区层面单一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而以全国为背景研究地区情况的则相对少见。本文将利用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二、评价指标与数据来源

###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1) 城乡收入差距指标

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测度通常采用高低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本文采用通用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即:  $IG = \text{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 / \text{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

#### (2) 金融发展规模指标

对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Gold Smith指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数量、种类和先进程度)和金融机构(数量、种类和效率等)。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就越多,金融的效率就越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用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去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金融相关率(FIR)是一定时期内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社会金融活动总量一般用金融资产总额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金融资产包括通货和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股票和其他股权、保险准备金、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产品和其他应收应付账款。结合McKinnon的建议,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

时,主要使用广义货币存量( $M_2$ )与GDP的比来测度。因此,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银行存款总额与银行贷款总额的和表示(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但将银行存款与银行贷款视为金融资产也是国际惯用做法)地区金融资产总额,经济活动总量则以地区GDP表示,即: $FIR = (\text{银行存款总额} + \text{银行贷款总额}) / \text{GDP}$ 。

### (3)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银行系统在地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银行系统在地区金融机构中的主体地位,用金融中介效率( $FIE$ )测度金融发展效率。金融中介效率主要包括运行效率和配置效率。运行效率指的是银行体系消耗尽可能小的资源成本(人力和物力)动员到尽可能多的社会资金(或者说是使实现配置资源所消耗资源数量达到最小);而配置效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将从资金盈余部门动员到的资金分配到最有效率的资金赤字单位<sup>[14]</sup>。 $FIE = \text{银行存款总额} / \text{银行贷款总额}$ ,即可以用储蓄与贷款的比值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sup>[15]</sup>。

## 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7—2008)和《重庆统计年鉴》(1987—2008)。分别对金融机构存款年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年末余额采取了序时平均数法处理;金融机构存款年末余额使用的是本外币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年末余额使用的是本外币贷款余额;其他原始数据未作任何技术处理;计量分析在Eviews 6.0上实现。

## 三、实证分析过程

### 1. 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纽博尔特(1974)和菲利浦(1986)指出,当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将会造成虚假回归;沃森(1989)也证明了当变量存在单位根(非平稳)时,传统的统计量( $t$ 值、 $F$ 值、 $DW$ 值和 $R^2$ )将出现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首先对 $IG$ 、 $FIR$ 和 $FIE$ 进行平稳性检验。记国家数据以 $CN$ 为下标表示,重庆数据以 $CQ$ 为下标表示,如表1所示。

表1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ADF 值	临界值	AIC 值	SC 值
$IG_{CN}$	(C,T,0)	-1.593 755	-3.268 973(10%)	-1.341 66	-1.192 300
$\Delta IG_{CN}$	(0,0,0)	-2.263 012	-1.960 171(5%)	-1.476 208	-1.426 501
$IG_{CQ}$	(C,T,0)	-1.732 925	-3.658 446(5%)	-0.492 712	-0.343 352
$\Delta IG_{CQ}$	(0,0,0)	-3.501 894	-2.692 358(1%)	-0.431 901	-0.382 193
$FIR_{CN}$	(C,T,1)	-1.856 027	-3.277 364(10%)	-2.329 594	-2.130 764
$\Delta FIR_{CN}$	(C,0,1)	-3.215 976	-3.040 391(5%)	-2.388 979	-2.130 764
$FIR_{CQ}$	(C,T,1)	-2.446 949	-3.673 616(5%)	-1.823 324	-1.624 495
$\Delta FIR_{CQ}$	(C,0,1)	-2.736 705	-2.660 551(10%)	-1.705 220	-1.556 824
$FIE_{CN}$	(C,T,1)	-3.067 764	-3.277 364(10%)	-1.738 620	-1.539 791
$\Delta FIE_{CN}$	(0,0,1)	-2.263 012	-1.960 171(5%)	-1.476 208	-1.426 501
$FIE_{CQ}$	(C,T,1)	-3.171 144	-3.673 616(5%)	-4.061 063	-3.862 234
$\Delta FIE_{CQ}$	(C,T,1)	-3.962 005	-3.690 814(5%)	-3.786 652	-3.588 792

注:  $\Delta IG$  表示  $IG$  的一阶差分,其余类同;(C,T,L)表示检验模型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阶数L。

通过 ADF 检验发现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重庆市来看,其城乡收入差距( $IG_{CN}$  和  $IG_{CQ}$ )、金融发展规模( $FIR_{CN}$  和  $FIR_{CQ}$ )、金融发展效率( $FIE_{CN}$  和  $FIE_{CQ}$ )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同时也都是—阶单整的。

### 2. 协整检验

表1表明城乡收入差距( $IG_{CN}$  和  $IG_{CQ}$ )、金融发展规模( $FIR_{CN}$  和  $FIR_{CQ}$ )、金融发展效率( $FIE_{CN}$  和  $FIE_{CQ}$ )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它们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

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 VAR 模型的结构,因为 Johansen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 VAR 模型的检验方法。根据 AIC 和 SC 准则可以确定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 1,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2 全国数据(1987—2008)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协整 向量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5%)	P 值
0	0.628 308	32.423 96	29.797 07	0.024 4
至多 1 个	0.480 196	13.619 88	15.494 71	0.094 0
至多 2 个	0.060 617	1.188 117	3.841 466	0.275 7

表 3 重庆市数据(1987—2008)的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零假设协整 向量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5%)	P 值
0	0.817 908	43.209 27	29.797 07	0.000 8
至多 1 个	0.420 367	10.847 67	15.494 71	0.221 0
至多 2 个	0.025 246	0.485 834	3.841 466	0.485 8

Johansen 协整检验(表 2)表明在 1987—2007 年的样本区间内,全国城乡收入差距( $IG_{CN}$ )与金融发展规模( $FIR_{CN}$ )和金融发展效率( $FIE_{CN}$ )这 2 个变量之间存在 1 个协整关系。同时, Johansen 协整检验(表 3)表明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 $IG_{CQ}$ )与金融发展规模( $FIR_{CQ}$ )和金融发展效率( $FIE_{CQ}$ )这 2 个变量之间也存在 1 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估计分别如下,

$$IG_{CN} = 5.804 2FIR_{CN} - 13.270 71FIE_{CN} \\ (1.165 22) \quad (2.486 79)$$

$$IG_{CQ} = 1.796 810FIR_{CQ} - 5.687 213FIE_{CQ} \\ (0.187 60) \quad (0.463 69)$$

由协整方程,就长期而言,全国和重庆市均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

### 3.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和 Sims(1972)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质是确定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FIR_{CN}$ 不是 $IG_{CN}$ 的 Granger 原因	1	3.522 14	0.077 8	10%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FIR_{CQ}$ 不是 $IG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5.307 24	0.034 1	10%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IG_{CN}$ 不是 $FIR_{CN}$ 的 Granger 原因	1	0.049 52	0.826 5	10%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IG_{CQ}$ 不是 $FIR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4.087 34	0.059 2	10%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FIE_{CN}$ 不是 $IG_{CN}$ 的 Granger 原因	1	0.703 91	0.413 1	10%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FIE_{CQ}$ 不是 $IG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2.544 56	0.129 1	10%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IG_{CN}$ 不是 $FIE_{CN}$ 的 Granger 原因	1	6.121 98	0.024 2	10%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IG_{CQ}$ 不是 $FIE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0.065 79	0.800 6	10%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根据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得到以下结论:在 10% 显著水平上,全国和重庆市的金融发展规模是各自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 原因,但是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是金融发展规模的 Granger 原因,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是金融发展规模的 Granger 原因。同样,在 10% 显著水平上,无论从全国还是从重庆市来看,金融发展效率都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 Granger 原因,而全国的城乡收入

差距是其金融发展效率的 Granger 原因,重庆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是其金融发展效率的 Granger 原因。

基于本文研究目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对全国 1992—2007 年和重庆市 1987—1997 年与 1998—2007 年的金融发展效率数据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进行进一步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分别如表 5、表 6 和表 7 所示。

表5 1992—2007年全国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FIR_{CN}$ 不是 $IG_{CN}$ 的 Granger 原因	2	10.346 4	0.004 6	5%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IG_{CN}$ 不是 $FIR_{CN}$ 的 Granger 原因	2	1.950 87	0.197 8	5%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表6 1987—1997年重庆市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FIR_{CQ}$ 不是 $IG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0.119 59	0.739 6	5%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IG_{CQ}$ 不是 $FIR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5.969 84	0.044 5	5%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表7 1998—2007年重庆市数据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FIR_{CQ}$ 不是 $IG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5.898 95	0.051 2	6% 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IG_{CQ}$ 不是 $FIR_{CQ}$ 的 Granger 原因	1	0.108 46	0.753 1	6% 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

分析表明,全国在1992年至2007年间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是金融发展效率的原因表现不显著;1987—1997年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也是难以确定的,而1998—2007年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第3个变量(如制度变量),该变量是它们的共同原因。

#### 4. 脉冲响应分析

现在分别给变量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在不受其他变量冲击的情况下,得到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图1至图4是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时间滞后为10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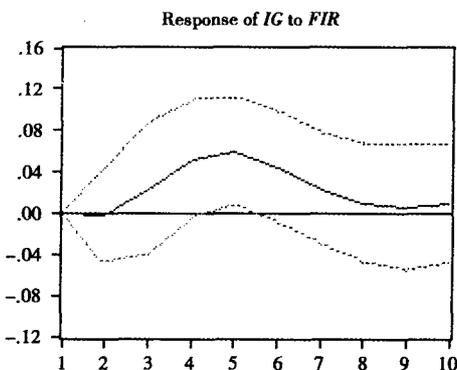


图1  $FIR_{CN}$  对  $IG_{CN}$  的脉冲响应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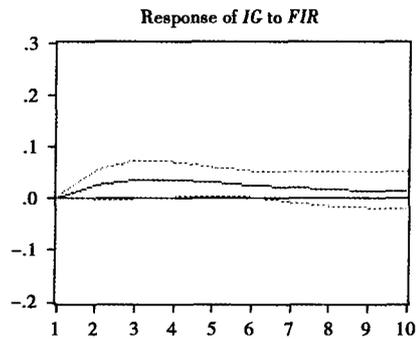


图2  $FIR_{CQ}$  对  $IG_{CQ}$  的脉冲响应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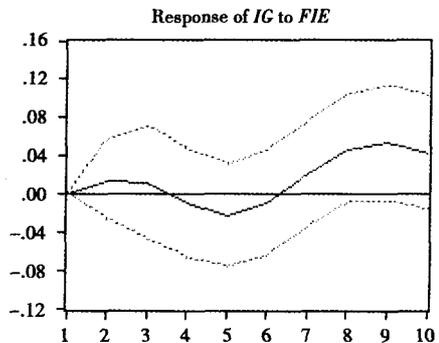


图3  $FIE_{CN}$  对  $IG_{CN}$  的脉冲响应曲线

我们不难看出这样2条结论:(1)综合图1和图2,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正效应。在图1中,这种正效应从滞后2期开始,到滞后5期时达到顶点,在滞后5~10期中正效应在不断地减弱;这样的正效应的运动轨迹在图2中有相同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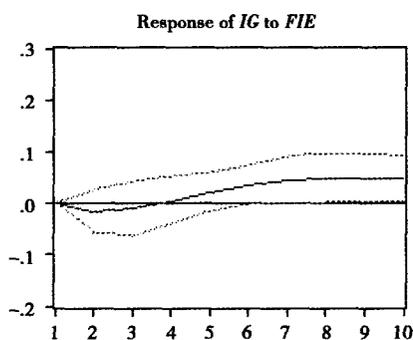


图4  $FIE_{CQ}$  对  $IG_{CQ}$  的脉冲响应曲线

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开始是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扩大效应,在扩大效应达到最大时,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起缩小效应,这一现象证明了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服从 Kuznets“倒 U 型”曲线路径。(2)结合图 3 和图 4 来看,在图 3 中,全国的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负效应是交互出现的,在滞后 1~3 期表现为正效应,滞后 3~6 期表现为负效应,并且在滞后 6 期开始持续的表现为正效应;在图 4 中,重庆市的金融发展效率与其城乡收入差距在滞后 1~4 期中表现为负效应,而从滞后 4 期开始则表现为不断上升的正效应。分析表明在某一段时期之后,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确实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 四、实证结果讨论

在对 1987—2007 的样本数据(全国和重庆市)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存在影响的。但由于不同的指标所代表的具体经济意义有差别,因此针对不同的指标体系,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和作用效果是不同的,具体讨论如下:

1. 结合协整方程、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且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是遵循 Kuznets“倒 U 型”曲线路径。本文认为,由于金融资本具有追逐利润的偏好,而农村地区风险高、收益低,风险和收益不能平衡,加上国家的重工业化战略,致使大量的金融资源集聚城市,而在农村则显的相对稀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刺激了金融资本向收益率高的大城市、大项目集聚,同时也导致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入城市,加速了城乡差距,使

二元结构的矛盾更加突出。但是,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增加农村金融规模总量对农村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 结合协整方程、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但这种收缩作用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相关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证明了这一点。根据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我们还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它是在一定时期之后才有显著的表现。本文认为,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效应的原因在于,虽然中国农村(包括重庆市)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金融资源配置存在不平衡性,但只要是融发展效率有所提高,还是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农村市场并将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这种负效应只存在某个特定时期,并且是在某个时期之后才有显著性表现。本文认为是金融体系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才能明显地发挥其作用。

3. 由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全国金融发展规模的弹性系数要比重庆市金融发展规模的弹性系数大,且全国金融发展效率的弹性系数也比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的弹性系数大。这说明全国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大于重庆市金融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全国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也大于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效应。上述结果意味着,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来看,重庆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要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本文认为,虽然国家对西部实施大开发战略,并将重庆设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但由于“大农村”的市情,重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偏小、金融效率低下,从整体上拉大了其与全国的差距。

4. 基于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来看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异:(1)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过程中,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显现的时间要晚于全国金融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显现的时间。(2)在脉冲响应分析过程中,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负效应显现的时间要早于全国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

收入差距负效应显现的时间。本文对第一个差异的解释为:金融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稳定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入和重庆市直辖(1997年)以来各项配套改革的纵深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水平(重庆市生产总值1997年为1360.24亿元,2007年为4122.51亿元)的提高,促进了信贷需求和供给,为金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本文对第二个差异的解释为:由于重庆市金融基础相对低于全国水平,加上金融资源在城乡分配的不平衡性,农村金融资源极度匮乏,只要有适量的金融资本流入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就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效应,从而使重庆市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负效应显现的时间要早于全国。

## 五、对策建议

1. 促进地区金融发展。首先要积极吸引国内外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来重庆开设分支机构,促进地区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打破现有国有银行垄断的状态,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地区发展的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工具,丰富金融市场,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再次要进一步加大对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走出一条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道路。

2.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金融规模的扩大不仅仅要有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在于质的提高。在扩大金融规模的过程中,农村金融规模的提升是核心。多年来,农村金融领域只是扮演“蓄水池”的角色,只存不贷,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入城市,支援城市工业化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存款资金的管理,控制农村资本流向,引导资金回流,使其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税收杠杆和利率杠杆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调节作用,以强化农村金融的支农力度和提高农村金融的服务效率。

3. 提高金融机构效率。要在金融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效率和运行效率。一方面要注重对内部员工的教育和培训,使其各尽其能;另一方面,提高自身的管理效率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农村金融而言,政府既要改善农村投资的政策环境,培育农村新的投资需求,提高农村的储蓄—投资转换率,发挥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

极作用;也要采用支持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鼓励现有的金融机构到区县设立网点,发展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扩大各类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对“三农”的资金供给,引导金融资本合理流入农村市场。

## 参考文献:

- [1] 黄应绘,李红,李智.缩小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J].统计与决策,2008(2):143-145.
- [2] Greenwood Jeremy, Boyan Jovanovic.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1076-1107.
- [3] Townsend Robert M, Kenichi Ueda. Financial Deepening, Inequality, and Growth: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R]. IMF Working Paper, 2003, 13(193).
- [4] Clarke George, Xu Lixin Colin, Zou Heng-fu.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 lternative Theorie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84, 2003.
- [5] 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49-59.
- [6] 杨俊,李晓羽,张宗业.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6(2):23-33.
- [7] 洪雪峰,王志江.中国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9):135-136.
- [8] 翟立宏,徐志高.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1978—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9(2):33-36.
- [9] 陈志刚,师文明.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和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44-149.
- [10] 唐礼智,刘喜好,贾璇.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44-48.
- [11] 李勇辉,蒋序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基于金融深化视角的实证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32-38.
- [12] 陈伟国,樊士德.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J].当代财经,2009(3):44-49.
- [13] 胡金焱,卢立香.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07[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0-17.
- [14] 李广众,陈平.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多变量VAR系统研究[J].管理世界,2002(3):52-59.
- [15] 王志强,孙刚.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7):13-20.

(编辑:南 北;校对:段文娟)